

隋代大兴城贵族寺院的营建

季爱民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史系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大兴城建立之后,关陇贵族一般出于祖先纪念的目的建立寺院。他们通过任职地、出生地等地缘因素吸引南方、东方等文化发达地带的佛教资源到新的都城,也将长安故城的财富转移供养新建寺院。聚集地方知识与物质财富的贵族寺院呈现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在相互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中形成都市风格,贵族寺院因而成为都市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大兴城; 贵族供养; 寺院营建

[中图分类号] K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2)11-0043-05 **[收稿日期]** 2012-08-28

[作者简介] 季爱民,男,江苏泰兴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长安社会文化的研究”。(09BZS009)

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朝廷决定在长安城东南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营建新的都城。大量宫苑殿阁、衙署民居陆续建成,佛教寺院也次第产生。完整的寺院需要从事佛教宣传的僧侣、组合复杂的建筑以及体现宗教信仰的绘画与雕塑装饰,联结大兴城佛寺营建中诸种要素的纽带就是关陇贵族对寺院的供养。

寺院的营建,主要指寺院建立过程中宗教资源的汇集与流动。从宗教供养的角度看,皇室供养的寺院可称为“国家寺院”,贵族供养寺院是“贵族寺院”。学界对于后者的讨论较少。澄清贵族寺院营建的史实有助于了解贵族寺院与国家寺院的互动关系。贵族营建寺院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地缘关系吸引地方佛教资源;二是迁移长安故城的资源到新的都城。

一、通过地缘关系吸引地方佛教资源

太平坊西门之北的定水寺由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在开皇十年为慧能禅师建立。辛德勇指出,杨纪弟弟内史通事舍人普安县开国男杨文慈、子上明国世子秘书郎杨孝堪居住在太平坊,杨家似在此聚族而居。^[1] (P54-55) 杨纪在北周时“自右侍上士累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安州总管长史,”与陈人屡有交往“将兵迎陈降将李璠于齐安,与陈将周法尚军遇,击走之。”^[2] (卷四八, P1295) 入隋后,“授使持节熊州诸军事、熊州刺史。丁艰去任,寻即起复。虽金革夺礼,而桀棘在容,僬勉王事,杖然后起。又为宗正少

卿,改封上明郡公……但汉地襟带,荆门遐阻,表里山川,一都之会,俞往之命,非才勿居。仁寿二年,授使持节总管荆、复、峡、郢、岳、澧、朗、辰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3] (《千唐志斋藏志》P453-454) 可见杨纪在与南人的交往以及任职荆州等地的过程中体认南方文化。

定水寺装饰方面具有南方风格。张彦远记载“定水寺,王羲之题额,从荆州将来。殿内东壁北二神、西壁三帝释,并张僧繇画,从上元县移来。余七神及下小神,并解倩画。殿内东壁孙尚子画维摩诘,其后屏风,临古迹帖,亦妙。中间亦孙尚子画。东间不是孙,亦妙,失人名。内东西壁及前面门上并似展画,甚妙。前面有三圆光,皆突生壁窗间。菩萨亦妙。”^[4] (卷三, P67) 其特点是寺院题额与大殿神像来自南方名手。

法琳记载荆州的地位和杨纪的政绩“荆门胜地,楚塞神乡。舳舻之所混并,水陆之所冲要。唯仁是寄,虽亲弗居。布政宣条,咸称繁赖。清风远沐,盛绩有闻。”同时也描述定水寺的装饰“启兹福地,置此仁祠。月殿流辉,珠台曜彩。华开粉壁,荷发圆池。至于郑氏维摩、孙公安养,皆为绝世,妙尽丹青。”^[5] (卷四, P519) 其中,“安养”为极乐世界的异名,此处指寺院中的净土变画,可见定水寺有孙尚子的净土变和郑法士的维摩变。这一记载与张彦远所记不同。法琳曾经访问都城诸寺。到了张彦远时代,隋代寺院壁画已有剥落漫漶,描述中有疑似之词,因此,前者应更为准确。

郑法士为活跃于周、隋时期的画家,彦惊评价他“取法张公,备该万物,后来冠冕,获擅名家。在孙尚子上。”李嗣真说郑法士“伏道张门,谓之高足,邻几覩奥,具体而微。气韵标举,风格道俊。丽组长纓,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江左自僧繇已降,郑君自称独步。”^{[4]《卷八》P160—161}说明他师法张僧繇取得很大的成绩。

孙尚子曾任睦州建德县尉。彦惊评价其绘画“师模顾、陆,骨气有余。鬼神特所偏善,妇人亦有风态。”李嗣真说“孙、郑共师于张:郑则人物楼台,当雄霸伯;孙则魑魅魍魉,参灵酌妙。”^{[4]《卷八》P162}张彦远认为其绘画师法“顾、陆、张、郑”^{[4]《卷二》P30}。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南朝画家,郑法士又师法张僧繇。可见,定水寺的绘画体现浓郁的南方风格。

这一寺院也是南方僧人的汇集之地。^{[6]《P185—186}释法称是江南人,陈平后与白云经师一起到大兴善寺。法称以善经呗得以经常出入宫掖,晚年移居定水寺,仁寿年间卒。释慧超(546—622)是丹阳人,出家后与智顗(538—597)到光州大苏山请益于慧思(515—577),隋初应太子杨勇邀请到大兴城,勇废后移居定水寺。吉藏法师(549—623)应晋王邀请先到青龙坊日严寺,讲学由三论转向关中颇为流行的《法华经》。隋唐之际,他的声望转高,受到太平坊两座寺院同时邀请“武德之初,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宛从初议,居其一焉。实际、定水、欽仰道宗。两寺连请,延而住止,遂通受双愿,两以居之。”其弟子智凯,在开皇时期陪同吉藏一起入关,但到都城之后学业发生改变,主要适应北方讲学环境“义业通废,专习子史。今古集传,有关意抱,辄条疏之。随有福会,因而标拟。至於唱导将半,更有缘来。即为叙引,冥符众望。隋末唐初,嘉猷渐著。每有殿会,无不仰推。”^{[7]《卷十一》P514;《卷二八》P687;《卷三十》P701-705)}

释僧凤的族祖是梁武帝,开皇初年师事大兴善寺僧粲(529—613)。贞观中年,“释门重闾。青田有稊,白首斯兴。非夫领括,无由弘护。中书舍人杜正伦下勅监掌统详,管辖奏召,以为普集寺任。寻更右迁定水上座。绥耳二寺,无越六和。妙达众心,欣其仰止。年及从心,更新诚致。繫维尘境,放旷山林。”^{[7]《卷十三》P526—527}僧凤任定水寺上座称为“右迁”,说明都城寺院分为一定等级,定水寺无疑有较高的地位。

定水寺在隋唐之际吸引学问僧讲学,可能出于其南方特点。南方僧人吉藏、智凯在关中讲学所发生的变化,也可知都城佛教本身已经形成风尚,南方

僧人带来的新风气融入到都城佛教传统之中。

位于兴化坊西南隅的空观寺,由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洵阳公元孝矩在开皇七年舍宅建立。这一寺院的僧侣来自关东地区,擅长《大论》及《杂心》的释僧朗来自恒州,入关住空观寺,以平素的风格得到尊重“复扬讲席,随方利安。而仁恕在怀。言笑温雅。有在其席,无闷神心。宏博见知,众所推尚。时有异问,素非所览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学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声大德咸美其识分,不敢蔑其高行也。”^{[7]《卷十》P507}精通《四分律》的释玄镜来自赵州。仁寿二年奉敕返回故乡无际寺置舍利塔,晚年在空观寺东院习禅^{[7]《卷二六》P673}。释慧藏(522—605)为赵国平棘人,开皇七年应诏到大兴城,为六大德之一。慧藏得以宣讲原来擅长的佛经“后以般若释论群唱者,多至于契赏,皆无与尚。时有沙门智稳、僧朗、法彦等,并京室德望,神慧峰起,祖承旧习,希奉新文。乃请开讲《金刚般若论》,藏气截云霞,智隆时烈。将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于时年属秋方,思力虚廓。但控举纲致,标异新理,统结词义,言无浮帆。故稟益之徒,恐其声止,皆崇而敬焉。”^{[7]《卷九》P498}这三人之中,僧朗到大兴城的时间似更早,因为慧藏讲《金刚般若论》的时候,僧朗已经称为“京室德望”了。

元孝矩与杨坚结为婚姻关系,在周隋之际接替杨勇镇守洛阳:(隋)高祖重其门地,娶其女为房陵王妃。及高祖为丞相,拜少冢宰,进位柱国,赐爵洵阳郡公。时房陵王镇洛阳,及上受禅,立为皇太子,令孝矩代镇。”^{[2]《卷五〇》P1317—1318}杨勇任洛州总管,管辖范围即北齐旧境“高祖辅政,立为世子……出为雒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2]《卷四五》P1229}法琳记载元孝矩的结衔与佛教供养“隋上柱国洛豫十七州诸军事洛州刺史左翊卫将军洵阳公元孝矩(造空观寺)。”^{[5]《卷四》P519}这是元孝矩任洛州刺史时的结衔,其统治范围与杨勇一致,玄镜、慧藏来自元孝矩统治地区,可知地方僧侣来到都城,选择居止的寺院与其供养人的统治地域有一定关联。

位于熙光坊南门之东的真寂寺,由高颎在开皇三年舍宅奏立为寺。法琳详细记载高颎为人以及寺院的营建过程“隋上柱国尚书左僕射齐国公高颎造信(真)寂寺及积善尼寺。(颎)器局和允,识虑优长……而善达世间,早知幻化。存心出要,笃志香城。至于七觉花台,三明宝殿,瑠璃梵宇,码碯禅龕,柰苑祇园,竹林檀阁。游者忘返,一一留人。凡是名

僧海内大德 慧崇禅师、道彦法师等 并感其敬信 同起伽蓝。又延信行禅师 别起禅院。五众云聚 三学星罗。道俗归依 莫斯盛也。又造积善尼寺 颇亦严华。”[5]《卷四》P519)

就寺院营建过程而言 法琳的记载层次清晰:高颀与慧崇、道彦是真寂寺的共同创立者。其中道彦就是道宣记载的释法彦。法彦姓张 寓居洛州 以讲学《大论》著称,“游涉法会 莫敢抗言。故齐、周及隋 京国通衢 皆畏其神爽英拔也。”高颀邀请他来都城讲学“齐公高颀(颀) 访道遐方 知彦声绩 乃迎至京邑。虽复智亮冒于当时 而谦素形于声色。”他的讲学影响了高颀家族的佛教信仰“彦传业真寂 道俗承音。左仆射高颀(颀) 奉以戒法 合门取信 于今不倾 并彦之开济。以大业三年卒于所住 春秋六十余矣。”[7]《卷十》P505) 高颀及其后人或舍宅为寺 或出家为僧 或宣传报应故事 持续供养佛教。[8]《P163—167)

真寂寺创建之后六年 迎来魏郡僧人释信行(541—594)。上引法琳记载高颀为之“别起禅院”,道宣记载“仆射高颀 邀延住真寂寺 立院处之。”[7]《卷十六》P559)《两京新记》记载“时有沙门信行 自山东来 颀立院以处之。”[9]《卷三》P57) 可见他有单独的传教之院。信行来大兴城的确切时间在开皇九年。太原介休人释僧邕(543—631) 在信行的劝说下与之一起到都城传教[7]《卷十九》P583)。这一具有个性色彩的教派后来不断扩展 与其拓展独立的传教场所不无关联。

高颀的父亲独孤宾(503—572)“字元宾 旧姓高 渤海蓊人。魏世大统中 赐姓独孤氏焉。”[10] 高颀本人“白云渤海蓊人”[11]《卷七二》P2487) 可见高氏认同山东文化 法彦、信行到真寂寺也有地域因素。

二、长安故城与大兴城之间寺院的关系

尉迟迥(516—580) 家族有信仰佛教。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二月 时任都督秦渭河鄯等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的尉迟迥在渭州建造释迦牟尼像[12]。法琳记载他在长安造妙像寺 又记其弟“周太保柱国大将军吴武公尉迟纲(517—569) 造褒义寺及宣化尼寺”。“尉迟纲” 宋本《辩正论》卷四作“尉迟安” 元本、明本作“尉迟纲”。赞词中有“父柱国大将军长乐公 夫人尚书昌乐大长穆公主” 是尉迟纲的父母 于尉迟安则为祖父母。因此 以“尉迟纲”为是。上述记载反映尉迟家族在北周时代的佛教供养 是周武废佛之前长安寺院的珍贵记录。

尉迟氏在大兴城供养数处寺院。《长安志》记

载丰安坊宣化尼寺“隋有宣化尼寺 武德中徙永平坊”[13]《卷九》P124) 这应来自《两京新记》。而金泽文库本《两京新记》永平坊条记载“隋开皇五年 周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尉迟安舍宅立”[9]《卷三》P53) 没有隋代迁徙来源的记载。按照《两京新记》的写作体例 可知金泽文库本《两京新记》至少省略了类似“寺本在丰安坊 武德中移来”这样的字句 否则会给人寺院自开皇五年建立之时就在永隆坊的印象。另外 这段记载有与史实不符处。周昌乐公主是尉迟安的祖母 已在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去世 [14]《卷二〇》P340) 不可能在隋代建立寺院。尉迟安为纲之嫡子 入隋“历鸿胪卿、左卫大将军”[11]《卷六二》P2215) 是宣化尼寺的实际供养人。

尉迟氏供养的另一处寺院为嘉会坊西南隅的褒义寺。金泽文库本《两京新记》卷三记载“褒义寺 本隋太保吴武公尉迟刚宅。初 刚兄迥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 移都后 刚捨宅复立于此 改名褒义寺。其殿堂屋宇并故都旧寺之林木。”学者对这一段记载中的史实讹误多有讨论 [15]《P129) 但未涉及新旧都城之间的关系。据上引法琳记载 尉迟纲在北周长安城已经建立宣化尼寺和褒义寺 则其子尉迟安在大兴城嘉会坊所建褒义寺就不存在改“妙象寺”为“褒义寺”的问题 而是新旧都城中不同寺院使用同一名称 表明佛教信仰在家族中的延续。另外 大兴城有妙象寺 [7]《卷二十》P590) 可能是尉迟迥的后人所建。转移旧都寺院林木一事则为可能之事。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废佛道二教的政策是“沙门道士并令还俗 三宝福财 散给臣下。寺观塔庙 赐给王公。”[16]《卷八》P136) 寺院财富原为贵族所供养 废教后转归贵族所有 待到隋初佛教恢复 则又成为供养物。《两京新记》致误原因 可能是注意到法琳的记载 但却没有区分新旧都城之间的延续关系 以致在宣化尼寺和褒义寺的寺院名称与供养人等方面造成混乱。

新旧都城同名寺院还有罗汉寺。北周长安的罗汉寺由豆卢宁供养“周柱国尚书仆射楚国公豆卢宁(500—565) 造罗汉寺及会宗寺” 法琳的赞词是:“燕文明皇帝慕容晃之后 祖什 文成皇帝直寝司隶大夫 父笃 柱国大将军涪陵公。宁年始弱冠 爱初筮仕 月角称奇 星精表德……造罗汉、会宗二寺。铸像写经 相续不断。”[5]《卷四》P517)

怀德坊西南隅有罗汉寺。《两京新记》记载:“开皇六年雍州牧、楚公豆卢勣(536—590) 所立也。”[9]《卷三》P64) 豆卢勣为宁的侄子 后立为其世

子。^{[14] [卷一九 P310]}由此可以推知,罗汉寺是豆卢勣为纪念其伯父豆卢宁而立,这是家族供养在周隋之际的延续。

常乐坊南门之西有云华寺,《长安志》卷九记载“本隋大司马窦毅宅,开皇六年,舍宅为寺。”窦毅(519—582)卒于开皇二年,则舍宅事当其后人所为。又窦毅在宣阳坊南门之西有宅,后部分舍入净域寺,窦毅曾孙仍居原地。^{[17] [卷三 P91 93]}《长安志》引《酉阳杂俎》云“本曰大慈。大历初,僧俨讲经,天雨花至地咫尺而灭,夜有光烛室,敕改为云华寺,俨即康藏之师也。”今本《酉阳杂俎》续集卷五没有“本曰大慈”四字,《长安志》或另有所据。段成式记载云华寺的得名缘由并不可靠。智俨(602—668)在其晚年确曾在云华寺讲经,并赏识其世俗弟子康法藏(643—712),不过,时间不在大历年间(766—779),而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至总章元年(668年)之间。^{[18] [P121—124]}其实,“云华”是这一寺院的最初名称。道宣《续高僧传》有三处提到云华寺,法琳记载“隋大司马上柱国神武肃公窦毅(造云华寺)。幼称令誉,长号通人。家有赐书,门标卫戟。供奉四帝,终始一心。义重龙文,财轻蝉翼。折狱动哀矜之念,临下尽宽和之仁。而护持三宝,体达五家。造寺建斋,以为常业。”^{[5] [卷四 P519]}可见以智俨讲经为寺名来源是只是盛唐以后的传说,与云华寺最初得名无涉。

窦毅叔父窦炽(507—584)在北周供养两座寺院“炽即安丰华胄也。昔专黄老,今信大乘。建白马、梵云二寺,种当来出世之业。”^{[5] [卷四 P517]}安丰指东汉安丰侯窦融(前16—62),曾以河西地区归附东汉政权。

窦炽侄子荣定(530—586)在北周、隋初立有军功,妻子是隋文帝姊城安长公主。开皇十年(590年)荣定子窦抗在延康坊东南隅建立静法寺。延康坊可能是窦抗一族居住之地。最近出土的抗第五子窦师纶(594—671)墓志记载其卒于延康坊^[19]。抗第三子窦诞(581—648)有宅在辅兴坊西南隅,^{[3] [第2辑 P96]}则与他在唐初联姻皇室的际遇有关。

静法寺的营建材料有多种来源“寺门拆抗宅柴戟门所造。西院有木浮图,抗弟璉为母成安公主建,重叠绮丽,崇一百五十尺,皆伐抗园梨木充用,其园本西魏大统寺,周武帝废佛教,以其寺赐抗为宅焉。”^{[13] [卷十 P126]}可见静法寺西园佛塔建筑材料来自长安故城。

惠详记载窦抗、窦璉兄弟对佛教的供养“司空

陈容公窦抗,早出中衢,宿知宝所。虽贵极台辅,而凝心妙觉。爰捨净财,立静法寺,庄严轮奂,将美天宮。其弟璉,行尽色难,志穷恶道。奉为考安丰公、妣成安公主,敬造《法华》《金刚般若》各一部。”^{[20] [卷十 P44]}静法寺建立之初,抗母城安长公主有重要影响。释慧海(550—606)在北周末曾经逃亡南方,隋朝建立之后,“城安长公主有知人之鉴,钦其德望,为立伽蓝。遂受以居之。今之静法寺是也。课业四部,三学兼弘。门徒济济,于今传美。”慧海确有寺院经营的能力“自海之立寺,情务护持,勤摄僧伦,延迎宾客。凶年拯及,振名京邑云尔。”^{[7] [卷十一 P509]}释普安(530—609)在开皇初年应长公主之请居住静法寺“开皇八年,频敕入京,为皇储门师。长公主营建静法,复延住寺。名虽帝宇,常寝岩阿,以大业五年十一月五日终于静法禅院,春秋八十。”^{[7] [卷二十七 P682]}总之,窦氏一族历北周、隋、唐,或联姻皇室,或建立军功,维持家族,能够在都城建造多座寺院,寺院成为这一家族兴盛的象征。

地方佛教资源向都城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央化”的途径多样,过程曲折。北周兼并北齐,废除宗教政策随之在整个北方推广,大量僧侣逃亡江南。隋代建立,标榜恢复佛教。军功贵族通过地缘关系与僧团建立联系,这种关系成为僧侣来到都城选择居止寺院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域的佛教资源流入大兴城有先后之别。北周末年佛教逐渐恢复,社会上的佛教信仰仍以原北周地区为主,寺院供养人主要是关陇贵族,构成都城佛教信仰的关中特点。隋初迁都至平定南方前后,关东僧侣迁居关中,形成都城佛教的北方特点。平陈之后,南方佛教资源成为贵族的偏好,部分寺院因而具有南方特点。都城寺院因这种地域关系会多少呈现地方风采。大兴城佛教因僧侣讲学的互动、艺术上的融会而显示出鲜明的都市风格。大兴城具备对地方的反馈能力,成为四方取则的佛教都市。

参考文献

- [1] 辛德勇. 隋大兴城坊考稿[J]. 侯仁之主编. 燕京学报, 新 27 期, 2009.
- [2]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3]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4—2006.
- [4]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俞剑华注释.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
- [5] 法琳. 辨正论[M].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52 册. 东京: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29—1934.
- [6] 小野胜年. 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资料篇[M]. 京都: 法藏馆, 1989.

- [7]道宣. 续高僧传[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
- [8]孙英刚. 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J]. 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第15卷,2009.
- [9]辛德勇辑校. 两京新记辑校[M]. 三秦出版社,2006.
- [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周独孤宾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11(5);刘呆运、李举纲. 北周《独孤宾墓志》探微[J]. 考古与文物,2011(5).
- [11]李延寿. 北史[M]. 中华书局,1974.
- [12]董玉祥、臧志军. 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J]. 文物,1985(5);杨皓. 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摩崖题记》摭谈[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3).
- [13]宋敏求. 长安志[M].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
- [14]令狐德棻等. 周书[M]. 中华书局,1971.
- [15]福山敏男. 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解说明[A]. 中国建筑与金石文研究[C]. 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3.
- [16]道宣. 广弘明集[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
- [17]徐松撰,李健超增订.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M]. 三秦出版社,2006.
- [18]Chen Jinhua. 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643–712) [M]. Leiden: E. J. Brill, 2007.
- [19]王庆卫. 新见初唐著名画家阎师论墓志及其相关问题[J]. 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11.
- [20]惠祥. 弘赞法华传[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

(责任编辑:郭洪)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of Monasteries Sponsored by Aristocracy in Daxing City

Ji Aimin

Abstract: Military noblemen constructed Buddhist temples for the purpose of ancestry worship in Daxing City in early Sui Dynasty. By every means, they buil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minent monks from southern or eastern China where Buddhism was prospered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n invited them to settled in the new monasteries. Meanwhile, in order to sponsor new temples, some noble families moved material wealth from Chang'an northwest of Daxing City. As a result, these temples made up of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Buddhism in the new capital.

Key words: Daxing City; aristocratic patronage; monastery management

(上接第149页)

- [3]许彬,罗卫东. 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加里·贝克尔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评述[J]. 浙江大学学报,2003(3). Xu Bin, Luo Weidong. Coordination Costs, Endogenous Division of Labor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view of Becker's Growth Model of Endogenous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2003(3).
- [4]赵达薇,李非非,罗默、卢卡斯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J]. 管理现代化,2008(1). Zhao Dawei, Li Feifei.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Romer and Lucas Human Capital Theory to Economic growth.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2008(1).
- [5]钱学亚,章丽君,林浣. 度量人力资本水平的三类方法[J]. 统计与决策,2003(10). Qian Xueya, Zhang Lijun, Lin Huan. Thre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Measuring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03(10).
- [6]冯子标,焦斌龙. 论人力资本营运[J]. 管理世界,1999(5). Feng Zibiao, Jiao Binlong. Comment on Human Capital Operations. Management World, 1999(5).
- [7]王金营. 中国经济增长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需求[J]. 中国人口科学,2002(2). Wang Jinying.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Human Capital Needs. Population Science of China, 2002(2).
- [8]侯亚非,王金营.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 人口研究,2001(5). Hou Yafei, Wang Jinying. Human Capital and Transition in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Research, 2001(5).
- [9]李建民. 人力资本与经济持续增长[J]. 南开经济研究,1999(4). Li Jianmin. Human Capital and Continuing Economic Growth.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1999(4).
- [10]王金营.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核算[J]. 中国人口科学,2005(3). Wang Jinying.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Growth of Western Provinces. Population Science of China, 2005(3).

(责任编辑:刘旭挺)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n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of Active Popu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LiuFan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stock on economic growth, many scholars to the household population of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as a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er capital GDP and GDP in China between 1998 and 2010, this paper uses a model which has been improved through the Cobb-D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built a regression equa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by selecting GDP as exogenous variable,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and human capital stock of employed population as endogenous variables in order to get a nationwid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 we made a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ata aggregation in SPSS which has been checked for the appreciable impact by applying an elasticity coefficients as 0.05 of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human capital stock of employed popula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then propose a suggestion about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active population; 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ion rate